

大学书法教材



大学篆刻创作教程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 编



大学书法教材

大学篆刻创作教程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篆刻创作教程 /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7

大学书法教材

ISBN 978-7-80696-913-7

I. ①大… II. ①中… III. ①篆刻—技法(美术)—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J2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2477号

大学篆刻创作教程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7.5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13-7

定价: 60.00 元

学术评估委员会

主任 启 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澄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丛文俊 吉林大学副教授

冯 远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刘正成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刘 江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刘炳森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

佟 韦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沈 鹏 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

欧阳中石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季伏昆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

尉天池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总策划 路 棣

主 编 陈振濂

副主编 刘景茂 席树业 周俊杰 雷志雄 靳维贤

本书主编 陈振濂

编 委 沈乐平 王义骅 季 琳 朱艳萍

主题: 忠实临摹 / 65

- 单元一 古玺临摹 / 65
- 单元二 汉印临摹 / 71
- 单元三 明代篆刻临摹 / 79
- 单元四 圆朱文印临摹 / 86
- 单元五 浙派印临摹 / 91
- 单元六 皖派印临摹 / 98
- 单元七 赵之谦篆刻临摹 / 102
- 单元八 吴昌硕篆刻临摹 / 106
- 单元九 黄士陵篆刻临摹 / 110
- 单元十 边款刻制与拓制 / 114

第四章 二年级训练程序 / 125

主题: 基本技巧分类 / 125

- 单元十一 篆法——印文处理: 用篆变化 / 125
- 单元十二 篆法——印文处理: 省减 / 133
- 单元十三 篆法——印文处理: 繁饰 / 137
- 单元十四 篆法——印文处理: “篆书化” / 143
- 单元十五 刀法——线条处理: “藏刀之法” / 153
- 单元十六 刀法——线条处理: “露刀之法” / 157
- 单元十七 刀法——线条处理: 切刀 / 162
- 单元十八 刀法——线条处理: 冲刀 / 166
- 单元十九 刀法——线条处理: “细篆而刻”“反复篆再刻” / 173
- 单元二十 刀法——线条处理: “不篆直刻”“粗篆即刻” / 177

第五章 三年级训练程序 / 181

主题: 形式与变化 / 181

- 单元二十一 形式——外形 / 181
- 单元二十二 形式——边框 / 186
- 单元二十三 形式——界格 / 189
- 单元二十四 形式——剥蚀 / 193
- 单元二十五 形式——空白 / 198



单元二十六 变化——风格 / 203

单元二十七 变化——线条 / 210

单元二十八 变化——印篆 / 214

单元二十九 变化——形式 / 219

单元三十 变化——边框 / 227

第六章 四年级训练程序 / 230

主题:从临摹走向创作 / 230

单元三十一 历史流变:古代 / 230

单元三十二 历史流变:近现代 / 237

单元三十三 唐宋官印样式 / 246

单元三十四 民间风:陶文砖文瓦当文之属 / 251

单元三十五 图形印 / 256

单元三十六 花体杂篆的特权 / 265

单元三十七 抽象符号的介入 / 270

单元三十八 印刷字体与篆刻 / 276

单元三十九 外文字母 / 280

单元四十 走向大美术的篆刻:视觉形式变化 / 288

附录一 / 295

附录二 / 297

附录三 / 301

下编 理论编 3/303

第七章 篆刻史专题研究之例 / 305

| 近现代篆刻史 / 305

第八章 篆刻美学专题研究之例 / 319

| 篆刻美学导论 / 319

第九章 古代印谱专题研究之例 / 341

| 早期印谱二题 / 341

第十章 印学社团专题研究之例 / 350

| 印学话西泠 / 350



第十一章 印家专题研究之例 / 363

|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 / 363

第十二章 印章考证专题研究之例 / 380

|款印综考 / 380

第十三章 印文化专题研究之例 / 391

|论宋代文人印章的崛起及其表现 / 391

第十四章 印章制度专题研究之例 / 405

|论宋代官印制度及其时代特征 / 405

第十五章 篆刻批评专题研究之例 / 424

|篆刻古今盛衰论 / 424

第十六章 地域篆刻专题研究之例 / 433

|关于台湾篆刻艺术的考察与研究 / 433

附编 资料编 / 443

中国印学年表简编 / 445

中国印学典籍目录提要 / 545

上 编

知
识
编



第一章

印学发展史

第一节 玺印史前史

新石器时代以降,在陶器的制作上已使用印模,这一事实,似乎已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印章产生的前提和讯号。

印章,作为一种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它的本质属性是一种实用性工具,一种具有交接、凭信的手段和功能的工具。

根据文献记载,《周礼》曾提到过有关“玺”和“玺节”的故事。如《秋官·司市》条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条有“货贿用玺节”;《秋官·职金》条有“辨其物之微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等等。郑注“玺者,印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周礼》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成书于东周战国时期,时代贴近,应该比较可信。而且其中数次提及的相关事项,都是与交换信物的经济特征联系。从这一点来看,印章最初的起源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和凭证作用的需要等诸多因素催化下而形成的。

罗福颐先生在论及印章的发生年代时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只有战国墓葬中有玺印发现,而其他商代和西周乃至春秋墓葬等都未能发现,无确证,所以严格地讲起来只能认定印章起源于战国时期。然而,从战国玺印的实物考察,它却已经相当成熟,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进化过程分析,从理论上讲春秋时期就应该有印章存在了。对此现象,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也讲道:“考古发掘中虽然还不曾发现过确实可靠的春秋时代的玺印,但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就文献记载来看,应



该说已经有玺印了。”《周礼》、《礼记》记载了玺和玺节的应用,《左传》有季武子用玺书的记载。《礼记·月令》中云:“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玺……”更可确定春秋时代有玺印的事实。同时认为,传世战国时代古玺数量不少,其中必有春秋时代的作品,只是现今还无法明确地将其区别开来。

所以,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玺印的存在,对这一观点,学术界在理论上基本认同。

若再往上追溯,情况又是如何呢?

于省吾《双剑篔古器物图录》载录了三件铜玺。这三件传为殷商时期的玺印,早在20世纪30年代为北平尊古斋黄氏所得(现存台湾),或曰出土于安阳,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印章实物。虽然它不是经科学发掘所得,但已有不少商史学者、甲骨文专家通过对印面的分析与同期实物图像的对比,认定应是殷商时期的遗物。这三枚颇有代表性的印章和同期存世的陶模、铜器却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技术性,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潜伏、一种积累。它的原始性格当然是存在的,但又在不断的发展和进化的。同时,抛开工具的实用性不谈,似乎更带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记号。古埃及、古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曾有这样类型的范例,最典型的如古埃及的蜥螂印(古蜥螂印有两类,一类是官方印章,一类是带有宗教和咒术等因素的信物)。



○安阳出土的三方铜玺

虽然,大量的可信实物与记载始于战国时期,且殷墟甲骨文中尚未有“玺”、“印”二字(金文中有“印”字,却只是“抑”字的初文),但进一步考察文献看到《尚书·大传》载有“汤以玺与伊尹”,《周书》载有“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宝座……”这两段材料,加上三方实物,具有综合参考价值,即非孤证,所以至少有一定的可靠度。而且1988年湖北长阳出土了两枚陶玺,从考古学家的地层关系论断,可以确定其时代下限为西周,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印章的起源”问题,大抵可以定为殷商时期。



近年来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黄帝、尧时期,即原始社会末期就有玺印了。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源于《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和《春秋合诚图》“凤凰负图授尧……其章曰天、赤帝符玺”的记录。但鉴于上述二籍的文字充满了神话色彩,多有牵强附会处,故其可信性还值得怀疑。

第二节 对战国玺印与秦代玺印的一点考察

“焚符破玺,而民朴鄙。”

“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印章已经广泛而普遍地应用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器物记名、标准量器专用等,都是战国时代的风气。

战国玺印形制大小不一。一般官印多为二三厘米见方,也有个例,如“日庚都萃车马”约七厘米;私印稍小,多在一二厘米间。形制上,除以方形为基本型以外,有燕国的长条形官玺、齐国的上出形官玺,也有圆形、扁方、三角形的私印,不胜枚举。

三晋地区(韩、赵、魏)出土官印有两大类:一是白文有边的,都是官玺,如“平阴都司徒”;一是阳文小印,如“乐阴司寇”、“乐阴司成之玺”。齐国地区出土官印中常有带纪事的,有的文字很长,如阳党之官印有“易敞邑圣遽盟之玺”八字,有的简单,如“齐立邦玺”:有标准量器专用的,如“陈华右莫廩口毫釜”。燕国官印多作长条形,并加细长柄,如“单佑都庚王卩端”。战国时期玺印,一类属于“物勒工名”,是手工业者专门打印在所制器物上的。齐国地区出土的印文字常很长,名氏之外包括籍贯,如“右敞邠鄙尚华里季贴”,多正方形。燕下都出的文字简单些,如“匍午”、“匍攻昌”,多长条形。郑州、洛阳等地出的文字更简单些,常只一二字,或方或圆形。这是在考古发掘中对实物的大致归类情况。

存世的战国古玺为数不少,印文总数逾三千字,可释读者超过三分之二。仅《十钟山房印举》就收录六百枚左右(包括印举之一和印举之三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玺印,具有战国文字的那种圆转、自然、结构多变的特点,这与后来以小篆为基本骨架的汉印文字格式的严谨、方整的态势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一批战国小玺,无论朱白文,或秀逸雅致、或醇厚雄浑、或朴素自然,风格不一,面目繁多,同样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战国玺印,有一部分在艺术表现上已相当精致、相当纯熟,更多的则是在稚拙中流露出一种纯真自然、无拘无束的神态——它是篆刻艺术史上的启蒙阶段,更是奠定印章风格史的强大的基础时期。

至于战国时期玺印的分域研究,则主要是根据当时各地区的文字风格、印文字体,即其相对独立、独特的本地文字体系之状况及形制而论的。由于牵涉到古文字学及考证的领域,这里暂不赘述。



○战国官印



○战国私印

秦代印章,应系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公元前 206 年西汉政权建立这段时期的官私玺印。秦始皇为了书同文,按照文字适应书写便利的原则,由李斯整理各地文字为小篆,于是在印章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趋向整饬规范,印形中以“田字格”、“日字格”为主要特征(包括半通印)。

秦印史,虽然经历的时间极短,但它却是战国玺向汉印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

旧时学者把传世的朱文小玺一律定为秦印,称“秦玺”。而事实上这批印章都是战国印,绝非秦印。因秦代制度,只限皇帝称“玺”,臣下一律称“印”。“玺”与“印”的称谓从秦代开始已经有了等级上的差别。卫宏《汉旧仪》卷上称:“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影响到后世,如汉代的“皇帝信玺”等,甚至还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等。因此这种“秦玺”的称谓不妥,倒是明代朱简在《印品》、《印经》中称为“先秦印”,与“秦玺”区分开来,这种定位比较准确。

秦代官印与战国官印相比,主要表现为三个区别:一是多用边栏;二是多有界格;三是用摹印篆。同时具有这三个特征的印章始创于秦,沿用至汉初,所以现在要把秦代官印与西汉早期的部分官印严格分清界限是有一定难度的。《汉书》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具体讲,就字体论,秦统一之后将各地的不同字体进行了一番清整和梳理,统一之后的文字即是“小篆”。以泰山刻石等几处的刻石为代表,所勒诏书、民间通用度量衡器莫不如此,只是有一部分器物文字的笔画较为方折。秦书八体,“五曰摹印”(许慎《说文解字序》),这种摹印篆已经在空间构造和体势上与战国时期的诸国文字拉开了差距,在文字处理的观念和手段上也拉开了差距。就形制论,秦代官印有其相对规范和一定的制度,而不像前期的各地印章制度,各自为政,大小悬殊,式样不一。而秦印则将那种有边栏和界

格(主要是“田字格”)的类型作为定律修改并保留了下来,消灭了地方色彩和地域因素,逐步形成了规范、统一的格局。罗福颐、王人聪合著《印章概述》一书中,从考证的角度出发,以史籍中的官爵和名望等因素为依据,确定了带有田字格的白文官印基本上都是秦代官印。作为证明秦印的另一重要证据,则是在这批有边栏、带“田字格”或“日字格”、用摹印篆的印章当中有一部分如“邦侯”、“邦司马印”、“邦尉之印”等是带“邦”字的印章,而汉代因避刘邦讳,是以“国”代“邦”,所以这个史实也是证明这些是秦印而非汉印的有力的依据。

秦代官印主要是以凿刻为主(罗福颐先生曾有论,以凿刻和铸造两种不同的制作方式区分秦代界格印和西汉初期界格印),以田字格的样式为主的一种标准式。而秦代私印则不同,没有一种固定的标准。与官印相比较,则更多地表现为印文风格的多样性和制作手段的丰富化,甚至包括材质。秦代官印皆是铜印,而秦代私印亦有相当一部分为非金属质地者,或玉、或石(也有人认为此类非金属质地的印章均是殉葬明器)。秦代私印的风格与制作的差异,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秦代从统一到覆灭,前后仅仅十五年,可想而知,秦代公民,其中既有经历了战国的秦代者,亦有经历秦代的汉代者,或者更有经历了这三个历史时期者,故政治上的变革与朝代的更替,用考察断代史的眼光来看,就必然使这些民间实用品比官方印章具有一种更大的跨度。陕西咸阳一带出土的一批秦代私印,或可证之。

秦代私印中,铜印类型者往往有边栏和界格,印文也偏于厚重、遒劲,显得较为端庄沉稳。非金属质地者,如一些玉印、石印的类型则印文多显露着一种或随意自然,或温婉转的基调。印面尺寸,非金属材质往往略大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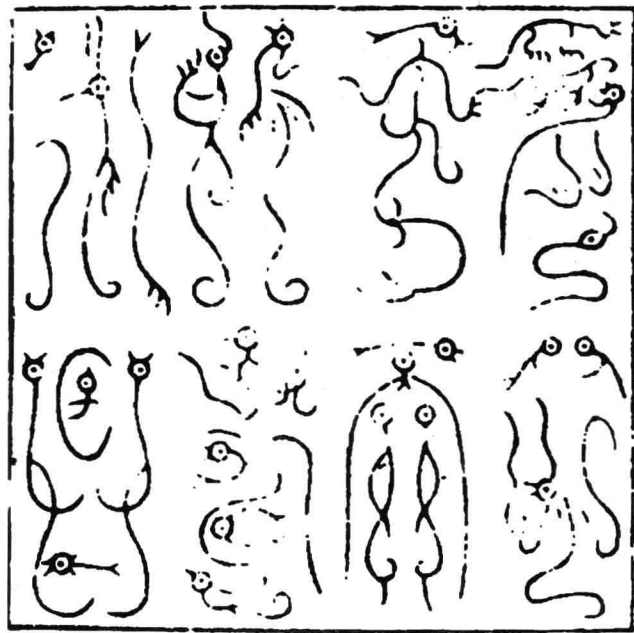


○秦代官印



○秦代私印

关于所谓的“秦始皇传国玺”,不止一方,印文多为“受命于天,既寿水吕”或“受天之命,既寿且昌”之类,印文皆作鸟虫书——虽然秦朝器物中亦不乏鸟虫书,但清新秀美,不像这些传国玺,造作粗俗,故弄玄虚。且其印体之大,钮制之劣,显然是后人的伪作,我们将之与“皇帝信玺”封泥拓片作一类比,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传)秦始皇国玺

(原大 11.2 cm × 11.4 cm)

第三节 印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汉印

8

“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奚冈语)的确，两汉印章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是印史上最为突出和灿烂辉煌的一页。而且，汉印也作为一种楷模成为后世的典范、学习的对象、参照的标准，甚至在元代以后被逐渐确立为一种篆刻艺术的审美对象和美学原则——对整个印章风格发展史的影响极大，极广。

西汉初期的官印、私印基本上沿袭了秦代旧制，有边栏或界格，文字主要是小篆，但体势不及秦印圆转，寓圆以方。西汉中叶以后，印章已基本不用边栏和界格，文字上更趋于平直方正，整齐端庄。称其为“缪篆”，是取其结体绸缪缜密的意思。汉朝享国年代较长，所以封建典章制度也较完备。汉武帝时期，作为表征统治阶级权力的玺印，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善的体系，从名称、质料、钮式、绶色上都有严格的界定和分级。比如称谓规定：皇帝、皇后、诸侯王的称“玺”，列侯、将军部属、郡县令长、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的称“印”，丞相、将军、御史、御史大夫、匈奴单于等称“章”……这套印章制度，在印史上是从汉武帝元狩年间开始，一直沿用到两晋时期以纸帛代替竹木简的应

用、印色代替封泥的应用之后才逐渐消亡——足足六七百年。

先谈官印：

汉代官印，除佩带在身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外，其次还用来钤盖于公牍的封泥上。当时的文书，多写就于竹木简、木牍之上，要传之异地，又不欲他人窥见其中的内容，于是就外加捆扎，并在结绳处加上一丸软泥，盖上印文使别人不便拆阅。这就是封泥，或曰泥封。等级不同，用泥也不同，皇上用紫泥，一般官吏用青泥。汉代官印一般皆作方形，大为汉尺的方寸，约2.5厘米见方。唯“嗇夫”等职位低、不列品秩的乡官，才用方寸之半（长倍于宽）的所谓“半通印”。《十钟山房印举》收录的“军曲”圆形印为伪作，而另一圆印“宁阳丞印”亦为磨改所成。

汉代官印一般以四字为多，也有五字以上者。盖太初元年，汉武帝认为汉以土德而王，土数为五，故印章亦应为五字为宜，所以有“印章”二字连言而凑成五字的官印。

汉印以铸为主，除武官和颁授少数民族头领的印章多为凿印外，一些地方官印，如“武陵尉印”也出凿。前面讲到，西汉初期，因沿袭秦代遗制的关系，往往有“田字格”或“日字格”的形式，且文字多用圆笔，笔道相对比较粗壮，流动自然，笔画并不屈满。西汉中期以后，界格与边栏的形式逐渐消亡，文字亦逐渐趋于方整，有些印章的笔画略加盘曲。

新莽时期只维持了短短十五年，印章制度继承西汉的遗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新莽时期的官印一般用五字——西汉时只有两千石以上如此，而新莽时则无论官职大小一律通用。两千石以上称“章”，千石以下称“印”。钮制方面，县宰以上用龟钮，其他用鼻钮。同时，由于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在度量衡和官制上都意图复古，所以印面尺寸稍小于西汉，一般不足2.5厘米见方。新莽官印中虽然出现不少“子”、“男”、“宰”、“马丞”、“徒丞”、“空丞”等与西汉不同的新的爵称与官职，但在印章艺术性方面，仍追求整饬、秀美，制作也比较精良、细致。

东汉官印，铸凿均有。铸印比较方整、平直，凿印不如铸印整齐，但也疏密有致、天真自然。东汉官印的大小尺寸与西汉官印基本相仿，但在文字的严谨和规范程度上已不及西汉，有“不合六书”的现象。

再谈私印：

汉代私印出土的数量也不少。私印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名印、表字印、臣妾印、吉语印和肖形印等。

西汉前期的私印，还有秦印的遗风，稍后则框格渐少，文字亦趋向匀整——笔画多的字占的空间就大，反之则少，务求整齐庄重，使空间分割均匀。印文中也有加“印”、“之印”者。西汉中期，朱白文相间印及文字四周有四灵图案的形式开始出现。这个时期，文字变化已极其丰富，方折匀满者有之，挪让盘曲者有之，缪篆外，鸟虫书入印的也

